

陶行知年譜稿

教育科學出版社

PDG

序 言

陶行知先生(1891. 10. 18——1946. 7. 25)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他从1917年自美国留学归国后,毕生献身于人民教育事业。后十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除了从事人民教育事业外,积极参加了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写了大量的著作,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研究陶行知所走过的道路,研究他给我们留下的教育遗产,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重要的课题。

对于陶行知先生的研究,应当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全面地系统地掌握有关资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他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实事求是地作出科学的总结。这本《陶行知年谱稿》在编写过程中曾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搜集了陶行知的著作和有关资料,到陶行知先生活动过的地方作了调查访问。它为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线索,相信它对陶行知的研究工作会起到一点有益的作用。

董纯才

编者说明

一、为了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需要，我们搜集了他的著作和资料，并曾到南京、上海、重庆、安徽等地作了调查访问。以后又进一步查阅、查证和研究了大量资料，几经增补修改，编写了这本《陶行知年谱稿》。本稿按照年代顺序介绍陶行知先生生平主要活动和著作，编者不加评论，以利于读者思考研究。

二、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曾访问了陶行知先生生前的很多友好、同事、学生和亲属，得到他们热情的接待和帮助。四川、江苏、上海、安徽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的同志们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示感谢。

三、由于我们的水平和目前所能搜集到的资料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期望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提供更多的资料、查证线索和宝贵意见。来信请寄：北京北环西路10号。

四、本稿是在董纯才同志指导下，由郭笙、刘硕、顾延蕃编写的。曾参加初期的搜集材料和调查研究工作的还有金元逊、夏德清同志。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室
《陶行知年谱稿》编写组

一九八一年十月

目 录

序 言

编者说明

年 谱(1891——1946).....(1)

参考文献、资料目录.....(145)

年 谱

一八九一年(清光绪十七年)

鸦片战争后的五十一年,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十月十八日(农历九月十六日) 陶行知诞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林。原名文濬(乳名和尚)。父名槐卿,号任潮,秀才出身,在休宁县万安镇经营亨达官酱园,有地四亩。后酱园倒闭,回家务农。母曹翠仂,勤俭持家,种过地,做过佣工。

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 五岁

旸村私塾先生秀才方庶咸认为陶行知天资聪颖,愿收为弟子,因陶家境清贫,无力供读,方免收束修代为开蒙。后由其父教识字读书。

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七岁

陶行知随父去休宁县万安镇外祖父家,被留在万安吴尔宽家经馆伴读。他曾在三刻钟内熟读背诵《左传》四十三行。

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十五岁

陶行知父为歙县耶稣教内地会会员,母在教堂内帮佣。内地会办崇一学堂,徽州主教英国人唐俊贤为校长,见陶行知经常挑菜进城,并到教堂帮助母亲干活,喜他聪明勤劳,免费收

入学堂培养。学堂课程有英文、国文、数学、理化、医药常识等，他学业成绩突出。

在学堂宿舍墙壁上题词志：“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

当地西干十寺当家和尚勾结官府为非作歹，陶行知与同学一起为民出气，惩罚和尚，把木雕菩萨摔入河中。

一九〇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十七岁

陶行知在崇一学堂两年修完三年课程，提前一年毕业。

一九〇九年（清宣统元年） 十八岁

春，陶行知怀“医药救人”思想离家去杭州，入广济医学堂学习。

因不满广济医学堂规定不信教者不能享受免费实习待遇，半年后退学。到苏州投靠表兄，一度靠典当衣物度日。

一九一〇年（清宣统二年） 十九岁

得到唐俊贤的帮助，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后改名为金陵大学）文学系，学业成绩优秀。课余曾研究王阳明的学说和基督教义，并自学数理。起初，他英语水平较低，经努力并常与同学用英语辩论，不久程度有显著提高。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 二十岁

辛亥革命爆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成立了中华民国和南京临时政府。不久革命失败，政权落入反动派袁世凯手里。辛亥革命期间，陶行知组织爱国讲演会、运动会等活动，募集爱国捐，宣传民族

民主革命思想。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二十二岁

继续在金陵大学上学。任金陵大学《金陵光》中文编辑，在《金陵光》(中文版)第一期上发表《金陵光出版之宣言》等文，指出编辑出版中文版的宗旨为“保存国粹，灌输学术”。还发表《一夫多妻之恶果》(与刘佩宜合著)、《因循篇》(反对因循守旧，主张革新进步)等文，并翻译《美国大总统罗斯福传》。

九月份起，陶行知改任《金陵光》中文主笔。曾著《伪君子篇》，指出“天下非小人为患，伪君子之患耳”。在该文附记中，解剖自己：“我之大病根在喜誉恶毁，名之所在，心即怦然动，伪言行即不时因之而起”，表示要以“虽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不为”为指针，“及早努力，百折不回”。同时，还在《金陵光》英文版上发表了一些文章。

因受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影响，以“知行”为笔名发表文章(留美回国后正式改名为“知行”)。并把王阳明关于儿童教育要反对鞭撻、拘囚，应鼓励其“趋向”等论述译释为应当让儿童“自由发展个性”。

与汪纯宜结婚，全家迁居南京。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 二十三岁

年初，陶行知为《金陵光》撰写社评《民国三年之希望》。文中希望政治廉明，国内和平，民安其业，学子成材，“人人洗心革面，一刷污俗”等。后，又发表《惠罗先生激励支哥大学体育会诸君》，提出应“三育并重”的主张，说：“有学识道德而无健全之身躯，则筋骨不能劳，体肤不能饿，心意不能困，咸施夸毗之病夫，又何能运起学识道德，以树不世之业，而为人类造莫

大之福哉。”

六月二十二日在金陵大学提前一年修完本科全部课程，毕业成绩名列第一，获美国纽约大学文科学士文凭（金大在美国纽约州政府注册，故由纽约大学发给文凭）。

在毕业典礼上，陶行知宣读《共和精义》论文，阐述民主共和的重要思想。论文指出：“共和之三大信条”为“自由、平等、民胞”。他认为“纪律之内有自由，道德之内有自由，”故真自由“贵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之进化”；平等是“在政治上生计上教育上立平等之机会，俾各人得以自然发展其能力而为群用”；民胞是“博爱心生，国人以兄弟相视”，为“共和之大本”，重“共同目的，共同责任，共同义务”。主张共和主义“重视个人之价值，唤醒个人之责任，予个人以平等之机会”；“视人民为社会之主体”；认为“政府者人民之政府，人民自治以谋人民之福利”。在“共和与教育”一节中指出：“人民贫非教育莫能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能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现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

夏末秋初，得金大校长包文的部分资助，又以“百扣柴门十扉开”的希望，筹措旅费，去美国留学。入伊利诺大学学市政，与孙科同学。他一面学习，一面工作、劳动、卖文、卖讲，勤工俭学，以维持生活。

赴美船离吴淞口时，曾创作生平第一首诗《海风歌》。在船上见锅炉工人苦役情景，“简直象镗水刻到心窝里”。（陶行知：《人与煤炭·前言》）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二十四岁

获伊利诺大学政治硕士学位。

秋，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为实验主义教育家杜威、孟禄的学生。与胡适同学。

一月，陶父去世。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二十五岁

在哥伦比亚大学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

秋，怀着“要使全国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的志愿，由美国回国。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育学教员(后任教授)、教务助理。先后讲授教育原理、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课程。

十一月七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 二十六岁

《新青年》杂志于一九一五年创刊以来，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宣传科学与民主，抨击封建主义的旧制度、旧思想和旧文化教育，传播新思潮。陶行知回国后投入提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的活动。

五月，江苏省教育厅委托南京高师代办县视学讲习班，陶行知任主任教员，编教学法讲义，讲演新教学法。

秋，陶行知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提出改革旧教学方法，草拟教学相联方案，主张以教学法代替教授法，“在校务会议上辩论两小时，被校方拒绝，因此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名义”(陶行知：《教学做合一》)，以表示不妥协。

在《教育与职业》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提出“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养成生利人物”。认为发展“生有利之物”和“生有利之事”以“利群”的职业教育，“将见国无游民，民无废才，群需可济，个性可舒，然后辅以相当分利之法，则富可均而民自足”。文章指出生活“范

围之广，实与教育等。有关于职业之生活，即有关于职业之教育；有关于消闲之生活，即有关于消闲之教育；有关于社交之生活，即有关于社交之教育；有关于天然界之生活，即有关于天然界之教育”。文中还对职业教育的师资、设备、课程、选择学生等方面提出具体意见。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二十八岁

年初，由北京大学、南京高师、暨南学校、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共同组成中华新教育共进社，出版《新教育》杂志。陶行知为南京高师的编辑代表。

二月，陶行知在《新教育》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一文，批判旧教育“依赖天工”，“沿袭陈法”，“率任己意”，“仪型他国”，“偶尔尝试”，提倡“试验之精神”，主张以教育试验“塞陈旧之道”，“开常新之源”，发明教育之真理，以革新教育。

著《教学合一》(发表于上海《时报》“新教育思潮”专栏)，批判“重教太过”、“教学分离”，阐述“教师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于学的法子”；“做先生的应该一面教一面学”，不要只抄袭几本旧教科书，要“研究新的学问，求新的进步”。

撰写《普鲁士教育之基本改革》，提出“教育和政治最有密切的关系，若欲明白普鲁士教育上的改革，必须先明白现在普鲁国掌权的是什么人”，主张“教育即是生活，非将来生活之准备也”，“教育既为社会的一种组织，则宜有以简缩现在之社会的生活而取其雏形。”

五月二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应北京大学、南京高师邀请来华，陶行知陪同杜威在南京、上海讲学。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在十月革命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开始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五四期间，陶行知在南京组织学界联合会，任会长。五四运动消息刚传到南京，他即召开南京各校师生大会，发表演说，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支持反帝爱国运动。北方学生刘清扬南下京沪鼓动学运，往访陶行知，他给予亲切诚挚的勉励。

陶行知在南京高师改全部课程中的教授法为教学法。

撰写《第一流的教育家》，提出要“敢探未发明的真理”或“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才是“第一流的教育家”，倡导教育工作者应有“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献身教育事业。

在《新教育》第二卷第二期发表《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从“自动主义”（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德育注重自治）的思想出发，提倡实行学生自治的教育，认为这是养成民主共和国民等方面的需要。文章系统阐述了学生自治教育的意义、利弊、范围等问题。还首次提出“事怎么做，就怎么学，譬如游泳，要在水里游，学游泳就在水里学”。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 二十九岁

陶行知在南京高师继续进行改革：试行选科和学分制；组织发动学生开展文娱活动，演出“大转机”剧；开办暑期学校，发动留校学生教附近居民认字；提倡教职员学生互助；提倡男女同校，招收女生等等。

四月，杜威在南京高师长期演讲《教育哲学》、《实验伦理》、《哲学史》，陶行知担任部分翻译。

陶行知约梁启超、胡适、任鸿隽、陈衡哲等到南京高师作

学术演讲。暑期,在与胡适、王伯秋等谈论志愿时提出:“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陶行知:《创造四通八达的社会》)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 三十岁

南京高师教育、农、工、商科改为东南大学,陶行知任教授、教育科主任。

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

九月五日,美国教育史学家孟禄来华考察。七日在江苏省教育会演讲《共和与教育》,陶行知任翻译,后又随孟禄先后到广东、上海、福建等地。十一月十三日孟禄在浙江省教育会演讲《学理与应用》,由陶行知口译。他协同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在南京、上海、广东、福建、杭州、济南、山西、河南等地了解教育情况。

十二月,陶行知任《新教育》主干(即主编)。

十二月二十一日,实际教育调查社、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编辑社等开会讨论合并组成中华教育改进社,二十三日选蔡元培等九人为董事,陶行知为主任干事。会议期间,还确定改进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进行为宗旨”。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三十一岁

一月,陶行知继续陪同孟禄考察教育实况。二十二日在江苏一师,为孟禄演讲《旧教育与新教育的差异》作翻译。

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学制系统案后,一月,陶行知在《新教育》第四卷第二期上发表《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提出改革学制要经过“充分讨论研究实验”,过去只抄

袭外国，“都非健全趋向”。“对于国外学制的经验；应该明辨择善，决不可舍己从人，轻于吸取”；对旧学制“应当改革”，“亦有宜斟酌保留之处”，“去与取，只问适与不适，不问新与旧”，如此“才能制成独创的学制——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求的学制”。同期还发表《评学制草案标准》、《中国建设新学的历史》等文。三月，在《新教育》第四卷第三期上又发表《新学制与师范教育》，主张“教员的程度应当采取渐进主义”，建议“中学设师范科，高等小学设师范课程以解决急需之师资”。

四月二十五日，陶行知与蔡元培、李大钊、陶孟和、胡适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要求有一个“好政府”，提出政治改革的基本要求是：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

五月，陶行知出席筹划全国教育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与黄炎培共同起草委员会简章。在改进社主持京师教育状况和全国普通教育状况调查。

七月三日至八日，改进社于济南举行第一次年会，讨论教育革新问题。陶行知在会上做《社务报告》，强调调查研究，指出“我们应该用显微镜看中国教育不振兴的微生物在什么地方，也应该用千里镜看中国教育不发达的远因在什么地方，所以第一种手续就是调查”。调查一个地方的教育状况”和“调查一个问题的事实”。并指出“凡关于一个问题之事实，必充分调查后可得相当解决，调查后将调查结果报告出来，还要进一步谋方为有用”，强调“分门别类的研究”，“什么药治什么病”。在《社务报告》中还说：“世人以为无钱可以不办学，但武训不是这样想。他说就是穷到讨饭也要办教育。他是已经照这话实行的。”

在八月二十日撰写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报告叙》中

说，虽然全国分裂，但从十八省区、四十七都市有会员参加年会来看，“我们深信全国人民是愿意共同努力从事教育建国的事业。”

十一月，出席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八届成立会，讨论学制问题。

中华教育改进社接受美国学术团体捐款，由孟禄推荐的推士来华研究中学之科学教育。麦柯尔协助搞智力和教育测验。陶行知赞成此方法的实验推广。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 三十二岁

一月，在《新教育》发表文章，提倡女子教育，主张男女同学，并建议多办女中。

三月起，筹备赴万国教育会议的有关事务。

春，在题为《杭州大学之天然环境》的一封公开信中强调选择好大学校址的意义，发表了选择大学校址的五条意见。并提出办学校“要为人民用钱用的得当”，花钱办杭大，“不是为人民耗费，乃是为人民保险储蓄作最有益的投资。”

五月起，陶行知不担任《新教育》主干职务。

六月，与朱其慧、晏阳初等筹备成立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数月间，全国不少省也相继成立。陶行知与朱经农合编《平民千字课本》，以“自立”、“互助”、“涵养”、“改进”精神为四大目标。

受长子陶宏教次子晓光读千字课的启发，提出“连环教学法”，即让家里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我教你，你教他，他又教他”(陶行知：《连环教学法之发现》)。

七月二十八日，陶行知向东南大学校长提出辞去教育科主任职(保留教授名义)，以主要精力从事改进社主任干事工

作。八月初，迁家至北京。

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改进社第二届年会在清华学校举行。陶行知在社务会议上作报告。年会期间，与朱其慧、袁观澜、晏阳初、王伯秋等共同倡议，于八月二十六日正式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朱其慧为董事长。促进会宣言指出：“一个共和国的基础，稳固不稳全看国民有知识没有，国民如果受过相当教育，能够和衷共济，努力为国家负责，国基一定稳固。”“我们如想挽救全国不安的景象，除了把平民教育推行全国之外，决无第二个好办法。”

九月十二日，在致程仲沂信中说：“教育是共和的保障。”

二十日，在回答程仲沂信中谈“学问三要素”时说，体健“是学问的一个最要目的”，“天才是做学问的根据”，“不承认财力是学问的要素”，认为“穷苦和学问是好友；富贵和学问是仇敌”。

九月下旬，陶行知去杭州、上海宣传平民教育。十月初，到南京协助王伯秋推动平民教育。三日，致函朱其慧，建议聘晏阳初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五日，在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干事会议上演讲《活的平民教育要有活的干事》，在董事会上报告“连环教学法”，晚上又在女子师范演讲。六日，在南京公共演讲厅演讲平民教育。七日，参加平民教员会议，在金陵大学演讲《孔子纪念日与平民教育》，出席全市私塾教员会议。在南京活动期间，他还在大方栈、小乐意、万全楼等店铺，以及姚文采、郭秉文、郑晓沧、陆志韦、徐则陵、廖茂如、陈鹤琴等人家庭与栖霞寺，亲自试验推行平民教育。

十月十日，在给程仲沂的信中谈到发起平民教育促进会和推行平民教育的动机：“中国现在危亡之祸迫在眼前，万万等不及国民小学的学生长大之后再出来为国家担当责任。

我们必定要努力把年富力强的人民赶紧培植起来，使他们个个读书明理，并愿为国鞠躬尽瘁。”

十月十八日，陶行知到安庆推行平民教育。十九日参加安徽省会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活动，二十日至二十七日，分别对第一女师、全城牧师布道团、小学教员、徽州同乡、全城商董、苦儿院学生演讲平民教育，并向一女师学生讲《女子领袖对平民教育之使命》，向全城警察讲《警察与平民教育的关系》，向私塾教员讲《私塾与平民教育》，向全城和尚讲《平民教育与宗教》，每天都演讲，有时一日连讲五场。还参加当地平民教育促进会董事会议两次。二十八日，组织并参加了省署军乐队、吴团长的军队、湖隼舰海军、警察、商团、教职员、学生等共一万七千人推行平民教育的大游行。在此期间，他还亲自到江裕轮、菱湖公园、教育厅机关等处，分别试验由十人去教二十一人识字。

秋，为收容五四运动中因学潮被迫离校的安徽学生，陶行知与姚文采借南京灯笼巷安徽会馆创办了安徽公学（后迁白下路上江考棚）。陶任校长，姚任副校长。陶行知为公学办公室书写对联：“义则居先，利则居后；敬其所长，恕其所短”。并请熊希龄题校训：“实”。

陶行知撰写《安徽公学办学旨趣》一文，阐述真正的教育要“最注意以人教人”、“相亲相爱”的师生关系，提出师生“共学，共事，共修养”、“共生活，共甘苦”的主张。对学生要宽严得宜、“必使学生得学之乐而耐学之苦”等主张，提出“要以事为我们活动的中心”，“要用科学的精神在事上去求学问，用美术的精神在事上去谋改造，用大丈夫的精神在事上去锻炼应变。”在谈到改造环境时，提出“我们要有欣赏性的改造，不要有恐怖性鬼脸式的改造”。

陶行知开始注意到农民和乡村教育问题。十月三十日，在给金鸣歧的信中提出：“中国以农立国，一百个人当中有八十五个住在乡村里。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也就是到乡间去的运动”，赞扬在休宁北乡推行平民教育是“平民教育到内地乡村去的第一幕”，并提出了到乡村去的具体办法。

十一月十二日，在写给妹文溪的信中说：“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学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象黄河决了堤，向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信中还谈到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叫种种人受平民化”，一方面打通贫富贵贱“层层叠叠的横阶级”，一方面打通行业地区等“纵阶级”，沟通成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并表示“深信平民教育一来，这个四通八达的社会不久就要降临了。”

十一月，陶行知到南昌推行平民教育，曾到南昌监狱对四百名犯人演讲，说：“人间也有天堂地狱，若存好的念头，心中愉快，那时就在天堂；若存坏的念头，心中难过，那时就在地狱。”

十二月初，陶行知回到北京。倡办平民读书处，征集“活罗汉”（平民教育工作者），推广平民教育。他促请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及胡适、熊希龄等在各自家中办平民读书处，也在自己家中设立笑山平民读书处，由孙儿教祖母识字。

继续负责主持全国教育调查统计。至十二月，陶行知已开展各省区学务概况、高师学务概况、全国各学校教员生活状况、科学教员生活状况、京师公立小学教员生活状况、全国中